

I267

1144

叙

題 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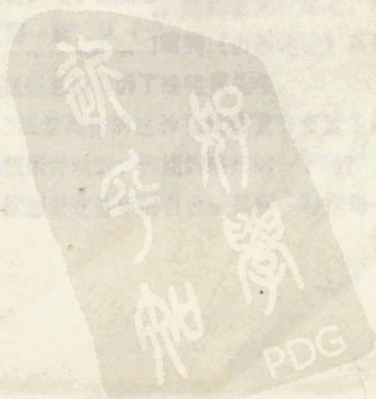
# 文明的碎片



I267

1144

# 文明的碎片



I 267  
1144

## 题 叙

一九九四年春天一个寒冷的雨夜，我与《文汇报》记者徐牲民先生在上海好望角宾馆相邻而居。直到深更半夜，徐先生还坐在我的房间里询问我一些问题。

徐先生问：“这些年海内外对你的散文评论很多，你如何评价自己在当代中国散文界的地位？”

我笑道：“为了免除作前后左右比较的苦恼，能不能允许我不把这些东西称作散文？现在被收入散文选的古代人书信和外国人讲稿，当初一定不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吧？”

我说的是真话。现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界那个界，已渐渐从以前的专业结构序列转化为人事关系网络，但不管是序列还是网络，我都觉得头痛。序列晾人，网络缠人，不小心一脚踩进里边，麻烦甚多。我为了谋生已经踩踏过好几个“界”，总是蹑手蹑脚地进去，又步履沉重地躲开，好不容易躲出了一点自由和松快，何苦又一头钻进散文界里边去？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奇怪的是，虽然强烈却无以名之，因此也无以尽之，写了一篇觉得不够又写一篇，从《文化苦旅》系列写到《山居笔记》系列，老想不写却还在写。——我把这些意思告诉了徐牲民先生。

徐先生说：“我觉得你的这种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题，但又觉得其中有一二个主题是频繁浮动的，你能约略归纳一下吗？”

我沉默了，回想着这些年的自己。是啊，写作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

的题材和主旨，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结线是什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标准把这么多陈旧的故事快速召来又依次推出的呢？说到底，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指令，使我坐立不安？

此时已是下半夜，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这个宾馆不知为什么起了“好望角”这样一个让人动心的名字，我一走神就觉得自己身处非洲南端的航海要道上。风雨交加的海天间应该有一座影影绰绰的灯塔吧，射出的光亮在黑雾白浪间明灭闪烁。我回过神来对徐牲民先生说：“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

徐牲民先生读过我的大多数文章，赞成我的这一表述。

## 二

蒙昧——野蛮——文明，这实在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人类学家常常把它们作为人类早期演进的三大阶段，那么，我们当然早已进入文明，而且千万年下来，早已进入一种充分成熟的文明。我们的一切举止作为，好像应该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它们理所当然地把嘲谑和消解文明作为自己的生存本能。设想到文明对此毫无警觉，它太相信那个所谓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对周围的世界仍然一往情深。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错看成文明。

在法西斯屠杀无辜平民的现场，一个母亲高举着婴儿喊道：“他还是个孩子！”然而喊声换来的是笑声和枪声。她原以为还有一个在人性边界上的最后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熊熊火光中，一位老人抓住了一双握

着几卷古画的手，低声相告：“这是郑板桥的真迹！”然而还没有等他说第二句，一蓬新的火焰早已腾起。他原以为还有一个文化价值上的起码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固然，这些都是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举目四顾，原以为有前提而事实上没有前提的实例比比皆是，只不过性质完全不同于杀人放火这样的特例罢了。

举一个最没有法律价值的例子吧。报载，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熄火，驾驶员请求乘客们下车推一把帮助发动，请求来请求去，下来推车的是一群去春游的小学生，大人一个也没有下车。小学生们憋着吃奶的劲儿竟然推动了这辆挤满大人的车，而当他们上车一看，他们原先的座位早已被大人们抢走。——车上的大人们怎么了？怎么会卑劣得如此一致？堂堂七尺、衣冠楚楚，却一起丢失了文明社会基本的前提！我们的忿恨，也只有在一定的前提下才能发生，没有前提，你再忿恨他们也无动于衷。

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会下车呢？因为他们还有前提。孩子有前提而大人没有前提，可见这里有一个失落过程。失落在何时何处？记得上海一家电台曾为此而开了一次讨论会。

讨论会上，一位乘客说，他过去遇到类似情况时也曾下来推过车，但公共汽车一旦被推动就直驶。而去；把推车人丢在半道，一次两次，大家就吸取教训，不愿推车了。

这显然是一个理由。我本人也遇到过推动了车却被丢下的恼人事情。于是再找司机参加讨论，一位司机说，车好不容易发动之后要开一程才能停下，看看那些推车人追不上也就不停了。

全有理，每一个理都说得通，但这些理的总和却是卑劣。这说明，社会上万事万物各自的理由组合不成文明。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然而，这种超越、协调、普及、提醒都是软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以上这个事例证明，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孩子们推车，我想，要感谢他们的老师，感谢安徒生和诸多美丽童话的构建者，也要感谢他们的父母，这些父母自己有可能已成了不肯推车的大人，但他们心底还会埋藏着一个有关善的梦影，在教育孩子时常常会高于自身，品行。熙熙攘攘的大街，人类拥挤的河道，生命密集的走廊，一双双稚嫩的小手推动着一群躲在铜板里的表情漠然的大人，这件事实在是一种会让人思虑再三的象征性造型。人类的童年和成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构？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是如此快速？我们不能不惶恐，今天欢天喜地地推着车的孩子，会不会过几年也成了不推车的一群？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难道只会教会他们剥除文明？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 三

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被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当然很吃力，就像那些孩子，推不动还要推，推动那么多漠然者，推动那么大的一个铜壳子，奔闹市间缓缓前进。是示范，也是自救，因为有那么多的理由诱使我们成为不推车的一群。推了，也就有了一个自我定位，即便今后背弃，也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

但是，文明的火种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头重新点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悄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具体说来，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这正是我多年来员为苦恼的难题。去年在哈尔滨，诗人李成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群文化人游长白山，路遇一位外国少年背着帐篷准备到山上野营，这位已经很

劳<sup>累</sup>的少年手上还<sup>仍</sup>持<sup>带</sup>着一个塑料口袋，边爬山边拾拣着沿路的废纸、果皮、空罐。他<sup>坦</sup>然地告诉那些文化人，从小在书本画册中就知道了长白山，这是他梦中的山，当然要把它收拾干净。他离开文化人独自继续爬山，拣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车，但大家都长久地沉默着。过了很久，气氛才重新放松起来，其中有<sup>一</sup>位随手把一块果皮去向窗外，车上的其他人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齐声喝道：“你还是人吗！”

这个在长白山上踽踽独行的外国少年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我终于明白，一切有志于传播文明的人至多也就是这个孩子，孤独地爬山，默默地拾拣，既没有表演意识也没有抱怨情绪，只是暂时性地清理了一条路，干净了一座山，明天也许还会被弄脏，但今天还要拾拣。什么时候被几个有心人看到，引发起有关“你还是人吗”的人本主义的思考，这真是可以满足了。

#### 四

然而，我们终究已经不是孩子。从生理年龄和文化年龄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的文化年龄和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相依相融。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闻。我们是一场漫长交战的遗留物，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真的。我们要推车，双手经络不畅；我们要爬山，两腿踉跄蹒跚。我们有权利在古战场的废墟上寻找和选择，却不能冒充一个天外来客般的无邪赤子，伪造出一种什么也不必承担的轻松和活泼。

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乡关何处》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我们的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而伤心，连所有的碎片也被潮水淹没了。区区如我，至多是一枚不知如何来到岸上由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



个遗址等待挖掘，只求在某种重温和反思中约略懂得自身。已经冲了，不怕再碎，只求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正是这番意思，使本书有了现在的标题。

## 五

最后顺便谈一谈编印此书的缘起。

我的那些被人们称之为“文化散文”的文章陆续出版、发表后，受到读者厚爱的程度让我惊诧万分。仅《文化苦旅》这本书台湾一年之内就重印了十一次，大陆的发行量当然还要大得多，但我每天还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叠倍要求代购；来信者的职业和文化程度千差万别，其间发生的大量戏剧性故事更是匪夷所思。尚未连载完的《山居笔记》系列，好像比《文化苦旅》还要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一个清醒的人，远没有糊涂到凭着读者们的一时热情而失去自我判断的分寸，我只是想，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思考价值，让我们进一步探测今天普通读者群的多方需求，探测一个当代文化人能让人世俗社会的程度，探测一场冗长的文学对话究竟能召集到多少对话者和听众。然而出版家们容不得我如此平静的思考，他们希望用多种方式、多种版本出版我的文集，家里的电话时时响起，有一半是为了这件事。我说，同样一篇文章收在几个集子里我怎么好意思呢？他们笑了，说我完全不植散文的出版常识，还举了一大串名家的例子。他们又说：“你目前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各地买不到你的书，你总希望有更多的人从不同途径读到你的书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做，为此我已经得罪了很多朋友和好几家著名的出版社。我只同意了我家乡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出我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散文选本。然而，专程来上海的出版家安波舜先生站到了我眼前，他带来了许多我所尊敬的作家们的一个意思，希望我也能涉足一下“布老虎丛书”，因为这个丛书也在做着文化人大幅度楔入世俗

社会的试验。他说得那样诚恳，那天他正思重感冒，嗡嗡的鼻音更让人感动。我终于答应交给他一本主题文集，主题就是文明，碎成了碎片而依然光亮的文明，让人神往又让人心酸的文明。选了一些与这个主题有关的篇目，为了在这个话题下。与读者有更多的沟通，因而又选了几篇访谈录和一篇演讲稿作为附录。

是为题叙。

1994年4月

## 上海失去了他

追悼会是在一年前开的。再往前推一年，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抽着烟，话不多，一再抬起头来，劝我保重身体。坐了一个多小时，他起身，下楼，推上那辆被他称之为“老坦克”的自行车，说还要看几个人，然后到华山医院看病。“老坦克”停在华山医院门口，他却再也没有出来。直到深夜，这辆“老坦克”还在路灯下孤零零地站着，谁也不知道，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

尽管上海这座城市曾经蛮横地放远了他，推拒了他的青春，他也不想端着一个苍老的晚年来惩罚它。他爽爽利利地为这座城市干了十年，然后又爽爽利利地悄然离去。

在胡伟民身上，上海文化的优势发挥得相当透彻。这种优势是一种大跨度的双相文化平衡：一方面是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巨大的创新精神，一方面是浓厚的世俗情趣和通达的传统意识。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产生尖锐矛盾的两个方面，但胡伟民却那么自然地把它们协调在一起，并把这种协调与自己的人格结构紧紧对应起来，构成一种整体感觉上的和谐。

胡伟民无疑是具备足够的经典意识和高峰意识的，他绝不允许目前

世界上有哪一种重要的戏剧思想对自己是纯然陌生的。他了解这些东西既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讲课，而是为了用自己的身心去体认，因为他坚信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去理解和体会任何世界水平的文化成果。我认识的中国导演也不算少了，但就吸收国际经典方面的恳切和虔诚而论，很少见到有胡伟民这样的。为了促使自己在这方面获得快速强化，胡伟民有不少莫逆的学者朋友。他从与陆谷孙教授的结交中了解了英语世界的文化，又从童道明先生那里深入触摸了他所喜爱的俄罗斯戏剧文化……几乎所有他所结识的学者都被他的求知欲望所感动。我本人在辈份上只是他的学生，但我惊讶地发现，我每出版一本理论书籍（未必都与戏剧有关），他总在短期内认真读完，并能对具体论点作出准确的评点。与胡伟民谈话是一种享受，极好的艺术感觉，充分的理论领悟能力，充沛的创造精神、常常与闪亮的眼神、爽朗的笑声和缭绕的烟雾拌和在一起，共臻化境。我写到这里时不禁又一次枪然心颠，我的冷清的书房里不再有了他，午夜的电话铃声也不再响起，他不再“蛮横”地强迫我在两天内读完他选定的剧本并出任他的顾问，他不再二话不说把我拖到剧组给演员讲课……，一个理论工作者失去这样一位艺术实践家，很可能是终身性的失去。对此，我不再刻意寻找。但是，就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城市而言，实在不应该失去胡伟民这样的追慕国际文化经典的巨大热忱。上海文化的光明面历来包藏着国际文化经典的充分养料，一切断断续续的小打小闹，不可能铸就上海文化的强力构架。是的，我们会有很长时间，看不到胡伟民重铸得那放有力的莎士比亚、奥尼尔和萨特了。国际名剧当然还会上演，但像他那样把个体人格与名剧精神交相融汇、并一部部组接成壮观精神画廊的情景，一时还难于复现。上海真的失去了他。

另一方面，胡伟民又是充分市民化、世俗化、民族化的。他从来没有哪一天因自己背靠着雄厚的国际经典而滋生斜眼看人的贵族意识。记得在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上，有几位艺术家在发言中抨击流行艺术过了头，竟然从根本上糟践起民间艺术，我们几个与胡伟民一起，反嘲得多么痛快。一些民间曲艺人才还低着头自惭形秽地接受那些人的数落呢，被我们这几个“学院派”一助威，感动得表情丰富。胡伟民从来没

有轻视过广大世俗观众，因此也绝不轻视各种世俗艺术，甚至敢于从本质上把戏剧看成是世俗艺术。这样，他不仅可以把世界名剧排得乐于被世俗观众接受，而且愿意一再直接去为各种地方戏曲剧团排戏，每每取得成功。于是，胡伟民真正忙碌起来了，经常走南闯北，马不停蹄，所接触的剧种越来越多，国内不少地方戏曲剧种也纷纷前来说请，上海在全国戏剧界的地位一度因胡伟民而获得升腾。这样一位导演与地方戏曲剧种通合，中间难免会产生某种不协调感，胡伟民有时也会为此而苦恼，但很快，无论是他还是剧团都被一种强大的艺术旋涡裹卷了，而最后作为两相遇合的成果出现的那台戏，往往是那个剧种发展历史上能让人长留记忆的一页。有时我想，就文化特质的差异而言，北京对于全国的影响是典范型的，上海对于全国的影响是渗透型的。上海未必经常会出石破天惊式的巨著佳作，但应该有胡伟民这样渗透型的艺术媒介体，活跃地向全国各地递送新生命的磁波。上海文化的魅力大多是这样发散的。艺术文化人才出现往往带有偶然性和奇迹性，因此他们的失去也往往留下难于弥补的空缺。这与科技领域梯队递进结构是有很大不同的。既然艺术文化最终晕化为一种感觉系统，这种感觉系统又与特定个人的生命构架紧紧相连，那么，要追获效仿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我不禁要略带悲观他说一句：胡伟民未必伟大，但在胡伟民之后想要复现胡伟民的光采，又谈何容易！

那么，我不妨再重复一句：上海真的失去了他；

我不知，需要多少时日，上海戏剧界能重新洋溢起那种近似于胡伟民的整体创造激情和青春活力，能重新呼唤出那种近似于胡伟民的自由心态和大家手笔。凭着上海的历史和文化氛围，总会有的吧。

伟民，我不知道这一年来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安息”，而我这二年来却因你离去而感到难以言状的寂寞。也看过不少台戏了，也参加过不少次剧本讨论会，有的被讨论的剧本还是你生前一再想排的，当然，也与不少戏剧家作过长短的交谈，但每次都会引起我的长长的叹息。我以前确实不知道，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竟然会使另一个人对一门艺术的整体对晤状态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请原谅，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我不太愿意多谈戏了。

(1990年6月在上海戏剧界纪念著名导演胡伟民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 老三届

今后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会不会把“老三届”作为一个专门命题加以论述？可以预计，不管怎么样的论述都很难抵得住这三个字本身的沉重。

被称之为老三届的人究竟有多少，这是不难统计出来的，但这批人波及的社会面之广却远远超过他们本身的数字。此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文革”中断了社会上的许多东西，甚至把万人仰望的许多至高职位也在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但最让人伤心、最所及民族元气、最关乎千家万户的是无数青少年的自然成长过程的中断。老三届这批人就是在将要成材而未成材、将要定型而未定型的当日上突然被拔离学习过程的。他们刚刚临近中学毕业，已经有了一点知识但还远不能依凭知识而自立，因而成了一群似乎有所执持而实际上却又无所执持的流浪儿；

其二，他们的流浪又不是自由的，必须在豪言壮语所掩饰的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跋涉到最贫困的乡村中为最基本的生理生存而拼死劳作。于是，青春的抛掷、父母的牵挂、情感的迷误、文明的退化……成了他们生命的主题，一度也成为人们对民族

前途颓丧的理由；

其三，当“文革”浩劫终于过去，他们可以回城的时候，老三届中很大一部分人早已身心疲惫、负载压肩。他们拾拣起多年前被剥夺的一切是那样艰难，但他们的年龄和境遇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生命的起跑线。比之于弟弟妹妹和外国同龄人，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太晚，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终于战胜了历史的玩笑，成了历史的脊梁。

在没有战争和灾荒的情况下，老三届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有文化的青年人中遭受最多磨难和折腾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经历不妨看成是一段历史的生命化缩影。文革的具体事端会渐渐淡忘，但这群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却以一种乖戾的生命方式作了永久性的记载。无论如何，这群人绝不是历史的展览品，他们还是咬着牙把中国历史的断裂处连接起来了。是的，历史曾使他们的生命断裂，设想到他们在修补了自己的生命之后立即又以生命修补了断裂的历史。这是一个颇具悲壮色彩的故事。

中国历史前进当然需要现代知识，但要让这些现代知识切于实用却又要本之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人生的灾难和坎坷使老三届特别了解国情，特别善于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判断各种事情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心目中的真正可行性，因此，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已追赶不上时代，却仍然在更多的方面成了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宰。他们与上一代和下一代都有明显的差异，但他们却能充分理解这两代，于是也就成了填补代沟的中介。有了老三届，老人和年轻人才不至于势不两立，诸多进退才出现了一系列并不响亮但切实可行的方案。看着现在在全国各部门成为默默无闻的业务骨干、中层干部”的老三届人士，以及他们中一部分为国争光的杰出专家，人们不能不心情复杂地感谢这些历史的牺牲品默默地成了历史的修补者。

不管历史如何发展，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一听到“老三届”这个命题就会激动，到哪儿都会以别样的心情关注这些比我年龄小不了多少的弟弟和妹妹。

不管历史如何发展，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一听到“老三届”这个命题就会激动，到哪儿都会以别样的心情关注这些比我年龄小不了多少的弟弟和妹妹。

## 都市良知

这件事说起来有点难以置信，但确实确实发生在今年的上海——

一位中年钢琴教师因思重病而生命垂危，他的学生、两位著名的青年钢琴家为他举办了一场演奏会。这场严肃而悲他的演奏会竟然爆满，有许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前来参加。听完演奏，上百名孩子出人意料地爬上台去用小手奉上他们的捐款。钢琴教师在病床上听完演奏会的实况转播后几小时就与世长辞，追悼会上，无数与这位教师素不相识的市民捧来了数不清的鲜花，据说那天殡仪馆一带的所有花店都被席卷一空。钢琴教师生前住在一幢公寓的五楼，他死后，不知从哪里涌来那么多鲜花花篮，从公寓底层大门排起，一层层排上去，一直排到钢琴教师故居的门口。

这位钢琴教师的名气现在在上海已被大家熟知，他叫范大雷，国际著名的钢琴家孔祥东、周挺便是他的学生。为什么范大雷之死会使整座城市哆嗦了一下呢？为什么熙熙攘攘的人群都突然为之而停步，职起了脚尖？只有一种解释：在不经意之间，这里出现了一种精神仪式，吸引着一切有某种精神需要的人都虔诚地参与其间。这种精神需要，就是人人对自己心底埋藏的珍贵部位的自我确认。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奉献，什么是人格，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教师，什么是学生，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放大家遗忘了的问题，都会在这种参与中浮现在眼前。人们围绕着范大雷所做的一切，强化了自己心底的善，也加重了一座城市的分量。

那么，这个精神仪式究竟是谁张罗起来的呢？范大雷本不是知名人物，他在卧病后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成名的学生来守护病危的老师也不是什么新闻，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在这样的时刻企图扬名的欲求，是谁在乎平常中发现了不平常，在悲剧中发现了崇高，在复杂的都市风景中找到了足以燃烧千万人心灵的火种呢？

是新闻界。

这无疑带要一大批记者和编辑同时发现这件事的精神价值而立即作出决断。这种情景果然出现了，没有上级指令，没有家属求情。更没有实利诱惑，竟然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么多新闻媒介全都动员了起来。说实话，今天上海文化心态的许多方面我不敢恭维，但遇到这样的事情，却又常常使我抬起头来重新打量。

在这样的事情中，很多上海人都能猜得到，有一位女记者一定会穿梭其问。果然没有猜错，是她，周玉明。那几天，文化界的朋友打电话来总会问一句：“周玉明写范大雷的文章看了没有？”

## 二

周玉明千方百计地想让社会理解艺术家，范大雷只是其中之一。本来，一些人不被社会理解并不是一件大事，犯不着记者为此而繁忙，但艺术家是社会的精神塑像、人格造型，或者说，是社会上人与人互相理解的中枢。累不相识的各色人等，就是通过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共同理解来进行沟通的。当艺术家无法被社会理解时，这种沟通也就会中断，由此对社会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对艺术家本身。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不理解贝多芬，是贝多芬的损失大还是社会的损失大？因此，乍一看周玉明是在维护着一个个艺术家，实际上她是在维护着整个社会，她不允许她所立足的社会对艺术家抱一种陌生和抵拒态度，她不忍心看到她身边的城市因缺少与广大民众声息与共的艺术家而失去魅力和风采。

周玉明的这一使命，在我们社会里常常显得特别沉重，因为我们周围不少人还不习惯用平等的态度来看待知名的艺术家，往往在过度的仰望和羡慕中夹杂着某种疑惑和规触，这就给一些嫉妒的流言提供了传播的温床。因此，越是杰出的艺术家一生遇到的麻烦事常常也就越多，就像雨果所说的，越光亮的正面必然带来越黑暗的阴影，而我们的艺术家又未必能凭个人的力量从阴影中走出。由于艺术家的知名度往往与流言的传播成正比，这种阴影不仅会快速扩大，而且也会构成一种邪恶的仪式，就像徐晓钟先生在《桑树坪纪事》中排演的那场“围猎”。回想一



下，我们民族，乃至我们文化界历来遭受的灾难，不正是在这种不负责任的口口相传中成倍递增的么？

处于困境中的艺术家往往并不企求青天大老爷来为自己解围，他们所要求的大多只是希望揭示事实真相。但难也就难在这一点，以至阮玲玉、老舍他们不得不用生命的代价来提醒人们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记者（哪怕是一个）敢于冲破偏见的围墙直通原始真实的勇气就弥足珍贵。记者——这实在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高贵的职业之一，他们可以不参加争辩，不发表评论，而只用事实说话，他们的全部道义感都隐含在对事实真相的充分挖掘中，他们应该是不可辩驳的，他们的生命本身就包含着历史的严谨，现代社会纷坛复杂，一切事物的真相都不易一眼看清，人们在不明真相前就投注评论的情感，哪怕是员真诚的，也往往会把事情彻底颠倒，这是无数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因此，真实是现代社会良知的基点。既然记者赋有把握真实的责任和能力，那么，只有他们才能有效地消解那些以不真实的流言为触发点、以惩善扬恶、走火入魔为归结的一个个起哄仪式，代之以范大雷逝世前后我们看到的那种崇高的精神仪式。周玉明多次说过：“作为记者，我必须尽一切可能到达现场，亲眼看到事实真相，亲手接触实物证据。没有第一手的真实素材，我什么也说不出。”这几句话所说的是记者起码的职业素质，但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缺少实证意识、特别喜欢随声附和，而且往往附和得慷慨激昂的国度里，却具有一种全民性的启蒙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玉明其实没做其他什么事，只是让社会认识了一大批艺术家的本来面目。因此她的贡献与其说是道义上的还不如说是历史上的。十分了解周玉明的哲学家赵鑫珊年生说，将来若有人写一部当代中国艺术史，周玉明也许不是一个完全不屑一提的名字。赵鑫珊并不是说周玉明本人要在艺术上占据什么篇幅，而是指她使历史变得更真实。

我想，当人们终于发现了一个个善良的艺术家和文化名人的真实生命，都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贴近、去温暖的。他们发现范大雷时已经晚了，即便洒下那么多眼泪和花撼也没有能够抓住他。人们抬起双眼茫然回顾：这座城市，还有哪些没有朽逝的高贵的生命需要卫护？有没有